

回到语境 的 理性

朱荣贤◎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语境



回到语境 的 理性

朱荣贤◎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回到语境的理性 / 朱荣贤著 .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016. 9

ISBN 978 - 7 - 5161 - 8822 - 4

I . ①回… II . ①朱… III . ①本质和现象—研究
IV . ①B025.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05127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喻 苗
责任校对 胡新芳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 //www. csspw. cn](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 5
插 页 2
字 数 278 千字
定 价 66. 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理性，是本书重点考察的对象。

在原始社会，在前传统社会（中国延续到传统社会）有现代意义上的“理性”吗？《野性的思维》和《原始思维》已经阐明了这一点。在“野性”或“原始”的岁月，既孕育了而后所有发展的胚芽，又处于原始的混沌之中。主客体不分，共同深深地嵌入于特定的语境之中，在实践中感悟周遭的一切。

自古希腊以来，理性成为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先是理性与经验的分野，理性与情感的对垒，再进一步的分化为科学理性与技术理性，前者在认识过程，后者在实践领域，实践必然涉及价值判断，于是便有了价值理性。理性一分为三，科学理性、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三者的关系成为研究的一个热点。20世纪以降，特别是下半叶以来，随着林林总总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对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的批判开始发酵，由此也引发关于理性的新的思考。

本书涉及的另一个主要内容是“语境”。语境，这一概念先出现在语言学领域，涉及上下文的关系等，随后被用到哲学，用于批判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波兰尼的“意会知识”和“编码知识”提出后，语境与知识的关系受到关注。再进一步细分，可以把编码知识区分为“非嵌入”编码知识与“嵌入”编码知识。前者的主要来源是客观事物，一旦提炼出来就与特定的认识对象、主体和语境完全无关，因而可以交流、迁移到不同对象和语境，为不同的主体所共享；后者涉及特定主体在特定语境中的活动方式及获得的经验，与对象、主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嵌入”或“粘着”于特定的语境之中，因而难以交流与共享。这样的知识，需要提供相应的语境，经由可以为各方所领会的隐喻，方可为他人所理解。

意会知识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客观的意会知识，如老中医切脉，厨师炒菜，以及司机驾驶汽车等，涉及主体在实践活动中的知识，这样的知识迟早可以编码，或嵌入，或非嵌入，如专家系统和自动驾驶等。另一类是主观的意会知识，关系到主体选择、接受和学习知识的能力，以及组合与创造知识的能力。主观的意会知识为特定的主体所有，是我之所以为我的根本点。一个多世纪前歌德就曾表示，那些达官贵人钦佩我，说我知识丰富。知识人人都可以学会，我之所以为我，是因为我的内心世界。歌德在这里说的“知识”，实际上就是非嵌入编码知识，而所谓“内心世界”，则是主观的意会知识。

从知识的角度来看，理性是什么？把非嵌入编码知识从客观对象中提取出来，由现象揭示本质，这是科学理性。科学理性既是认识的过程，由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也是一种信念，坚信多样与偶然的现象背后有普遍与必然的本质。

由客观的意会知识转化为编码知识，所涉及的是提炼概括某种实践活动的普遍和一贯的内涵，涉及到嵌入于特定过程和领域的各种技术和工程的特殊知识。各种门类的技术和工程知识再进一步抽象，就可以得出人类在一般的实践活动中需要遵循的普遍原则，如安全、可控、有效，以及投入产出比和功能价格比等，加上社会效益与可持续，这就是所谓的技术理性。技术理性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大量实践活动的提炼总结，这种实践活动的要义是：有限规则和重复博弈，只有在这样的实践活动的基础上，才可能抽象出为一般的实践活动所共有的编码知识。古人纷繁多变和各异的生产活动难以总结出技术理性，中国“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实践活动，“人心隔肚皮”，“打一枪换个地方”，也难以提炼技术理性。提炼出的“正能量”会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将心比心”，而“负能量”会是“窝里斗”和“内耗”之类。

在科学理性中，涉及到的主体是作为“类”的人，而技术理性中的安全、可控、有效，以及投入产出比和功能价格比等，显然涉及在特定语境下的特定个人或群体，于是价值理性浮现。马克斯·韦伯同时提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概念并非偶然。二者同为人的实践活动的不可分割方面。

需要指出，由大量实践活动抽象出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这一提炼的

途径及背后的信念就是科学理性。就此而言，科学理性是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共同基础。不仅如此，技术理性还要将自身建立于由科学理性所得到的非嵌入编码知识的基础之上，人类的任何实践活动都不可能违背事实与规律。进而，价值理性以科学理性与技术理性为基础，不仅需要遵循事实和规律，而且要可操作，等等。由科学理性、技术理性到价值理性，显示出类似于量子阶梯中的上向因果关系。

反过来，技术不仅以强大的手段推动科学，而且往往突破科学的界限，拓展在未知领域的实践活动，从而显示了技术理性对于科学理性的超越。价值理性不仅超越科学理性，而且超越技术理性。前者如“不自由毋宁死”，后者以“能做的，一定要做吗？”显示价值对实践与认识活动的选择与引导。由价值理性、技术理性到科学理性这样由上而下的关系，类似于量子阶梯的下向因果关系。上述分析大致限于20世纪之前，由传统到现代，以及现代性一统天下的时期。

20世纪特别是下半叶以来，各种后现代思潮滚滚而来，从不同方面对现代性进行“解构”。首先，面对回到语境之中的复杂对象，面对混沌、分形、涨落、突变，难以在时间与空间上区分对象，难以把对象从其语境中分离出来；其次，主体同样处于形形色色的语境之中，与对象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剪不断理还乱”，主体更多的是在此情此景的语境和行动中感受、体验对象，learning by doing。因而科学理性难有作为，传统哲学对认识和认识过程的重视让位于“实践优位”。不存在不变的、独立于对象、主体和语境的“基础”、“本质”和“非嵌入编码知识”，所有的知识都是“建构”的结果，科学理性已从昔日的高位跌落下来。源于实践的技术理性同样饱受诟病，尤其是其中的两个“比”所涉及到的“计算”旨在突出实践中的价值引导，也就是突出上面所谈到的下向因果关系，在因果决定和目的引导的关系上强调目的的引导作用。在这一转向的过程中还可以看到语境论的全面介入，由非嵌入到嵌入，由编码到意会，由逻辑到隐喻。与此同时，传统文化中的一些表述，例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将心比心”，在21世纪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由前传统和传统，经现代而后现代，在整体上显示了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由马克思的“两条道路”得到进一步理解。实际上，作者全书展开的逻辑框架就自觉地体现了马克思“两条道路”的思想，

以及体现了由历史到逻辑的方法论。

科学理性、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科学理性相对严谨且具有普遍性；技术理性显得宽泛，界限模糊，在不同主体间会有所差异；价值理性更加含混而难以把握，因人而异，因时因地而异，因语境而异。由此可见，由科学理性、技术理性到价值理性，语境逐一显现。科学理性排斥语境，要从语境中“脱域”（吉登斯）以“非嵌入”，技术理性不可避免要考虑到语境，而价值理性更是沉浸于语境之中。

梁漱溟曾述及人的三大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他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三大理性大致就相应于这三大关系。科学理性直接关乎人与自然在认识上的关系，技术理性在人与自然实践关系的基础上涉及人际关系，如市场中的竞争与合作，以及与消费者的关系等。价值理性不能切除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他人的关系，同时更深入地进入人的内心世界。由科学理性、技术理性到价值理性，也就是由物的外部世界，经他人的外部世界，到主体的内心世界。联想到语境论可以发现，主体的内心世界看似与由物和他人构成的外部世界无关，实际上却是深深地嵌入进而沉浸于五光十色的语境之中。

作者对理性的分析显示了扎实的理论功底，广博的知识积累，以及纯熟的写作技巧，而对中国和现实的关注则体现了作者的情怀和价值追求。把对于理性的抽象分析嵌入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语境之中，进而深入到汶川地震和中医体系这样的具体案例，其难度甚至较之抽象——马克思的“第一条道路”更难。

中国的发展路径有着太多的特殊性。一方面，未开化的野性思维和原始思维在某种意义上一直延续至今，而作为野性思维和原始思维对立面的理性，从未达到如在西方这样的地位；另一方面，野性思维和原始思维又显得如此成熟老练，数千年来左右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直至今日。这种思维方式的根本点是科学理性的缺失。违背事实和规律的事件一再发生，特别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实际上，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不认为存在一般意义上的“人文社会科学”，即使有，也必定要有“中国特色”。缺少了科学理性的地基，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之加和就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实用主义，不择手段，以及没有灵魂。中国传统文化，有待充实科学理性的地基。

然而中国不顾及科学理性的传统文化又确实具有现实价值。当今，处于各个发展阶段的不同国家和民族既共存于一个世界，又各自嵌入于极其多样的语境之中。这是一个事实判断而非价值判断，无所谓优劣，不关乎高下，在全球化中，世界各国既彼此竞争，又相互合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于是，体察各方特殊的语境，也就是各自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和合文化等思想，不仅成为本书“回到语境”和“大逻辑观”合理的组成部分，而且有了鲜明的时代价值。

本书作者朱荣贤是我带过的一位博士。在读博期间，朱荣贤就显示出对论文写作的精益求精，数易其稿。现在，我欣喜的看到，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朱荣贤又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祝愿朱荣贤再接再厉，在学术上取得更多成果。

是为序。

吕乃基

2016年4月于东南大学榴园

内容提要

研究理性的危机与重建问题，仍然是当前学界研究的热点。理性危机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理性在实践中表现出的本身固有的缺陷是其重要方面。本书从三个角度展开研究，得出理性未来的发展趋向在于再次回归语境：一是对理性发展历史的梳理与反思以及对未来趋向的展望；二是从现代科学的发展趋势以及后现代科学研究实践的角度开展研究；三是从实证案例角度，即通过分析案例中科学理性、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三大理性的关系及其与社会的相互联系，对研究中得出的结论进行验证。

研究中，纵向以历史发展脉络为线条。

人脑特定的生理结构是人类理性思维能力形成的重要物质基础，不仅如此，它还使人类的理性思维在形式和内容方面，既表现有普遍、似同的一面，也表现有特殊、境域的一面。远古人类在理性思维特征方面同样具有逻辑化特征，但思维“主客不分”的特征使理性表现出语境性的一面。古希腊以来，逻辑理性成为西方理性主义的重要特征，它的形成可由西方特有的“意欲向前”的文化路向，以及与自然博弈的文化这个视角得到解释。理性在从古希腊以后的发展中，数学理性和逻辑理性得到突出发展，在发展中理性逐渐发生了去语境化转变。

中世纪后期的经院哲学开始把理性运用于解释宗教，但走的仍然是一条逻辑化的道路。近代科学兴起，科学理性凸现，在认知路线上经历了从“本质主义”到“存在主义”的转变；在世界观上确立了普遍的机械自然观；在方法论上则形成了逻辑性的数学化方法，这些使近代科学理性成为“一种封闭的、绝对化的唯科学主义理性观”，片面、僵化、抽象等不足开始显现，为该理性埋下了危机的种子。但同时，也为它向对立面转化提供了可能。两次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提供了在相当长远和广阔的时空内相

对一致和稳定的案例，为技术理性抽象提供了实践基础。近代科学理性的缺陷与技术理性的膨胀促使价值理性的显现和提升。

未来科学的发展，将在更宏观与更微观的领域展开，并把事物的分岔、混沌、随机等不确定性作为研究对象。后现代科学不仅在对象方法上不同于现代科学，而且在规范上将以宽容、理解与协作、创造、自律与他律等新的范式实现对现代科学范式的扬弃。在现代与后现代科学面前，近现代理性先验、抽象、形而上学等特征得以暴露。这些都在一定意义上，为理性的语境性转向提供了动力。西方在理性重建方面提出了“从理性到合理性”、“从权威理性到批判理性”、“从先验理性到实践理性”转变的理性重建思想，所给出的理论普遍包含了理性重建的语境化方向。

在横向方面，对理性的基本内涵作了中西比较研究，对语境以及语境论研究方法作了深入探讨。特别地，对显得混乱的诸多某某理性，从分类、称谓的选择特点等方面进行了厘清。同时，提出两点看法：理性在形式上的泛化使理性在形式意义上表现出语境化的一面；科学理性、技术理性、价值理性是人类理性的主要形式。本书提出“大逻辑观”概念，来回答未来语境中理性存在的合理性问题，指出应该重建一种“在特定语境下广泛包容直觉逻辑、道义逻辑、多值逻辑等”的逻辑观。

理性具有生态性存在的一面，理性生态具有特定的结构和社会功能。未来，理性生态系统将走向更加复杂，几大理性形式的合理性标准更加语境化、嵌入化的发展趋势。理性生态的和谐，对社会良性运行具有特殊意义。当前，中国理性生态具有不和谐的一面。技术理性泛化，科学理性、价值理性相对衰微；社会观念系统中反主流多元化思想的泛滥等影响着中国社会的良性运行。构建和谐理性生态应关注：以科学理性为基础，增强价值理性引导力，遏制技术理性张狂；树立多元与主流合理共存观念体系等。

汶川地震和中西医论争的案例，为人们理解后现代科学研究对象及其特征提供了素材；同时，为理解三大理性在实践中表现的语境性、几大理性及其与社会的内在联系即生态性提供了现实材料。研究结论表明：理性必须与特定实践和具体的语境相结合，才有其存在的意义。

Abstract

The research of rational crisis and reconstruction still remains very hot in the academia. The crisis of rationality lies in many factors, of which its inherent defects are an important aspect. The dissertation does the research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and makes a conclusion tha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rationality depends on its returning to context once more: firstly, to consider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reflection of rationality and its logical expectation of its future trend; secondly, to do the research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modern sciences and postmodern study of sciences; thirdly, through empirical cases, namely, by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above-mentioned three kinds of rationality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society, to verify the outcome of the research.

The research is carried out according to a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rationality.

The special physical structure of human brains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substance of human rational thinking. Besides, it not only makes human rational thinking generally similar in form and content, but also special and contextualized. Ancient people also favor logical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their rational thinking, but they do not differentiate “subject and object” in their thinking, making their rationality show the property of context. Since ancientGreece, logical rationality has become th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 of western rationalism, which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unique western “intension to move forward ” and their culture to fight against the nature. After ancient Greece, mathematical and logical rationality got a salient development, getting rationality decontextualized

gradually.

After medieval times, scholasticism began to apply rationality to explaining religions, which is still a logical approac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cience made scientific rationality salient and made it experience the change from “essentialism” to “existentialism” in its understanding; in viewpoint of the world it has established a common mechanical view of the nature; in methodology it has formed a logical mathematical method, making modern scientific rationality become “a closed and absolute rationality of scientism”. So rationality began to show its one-sided, rigid and abstract shortcomings, which made a potential for its future crisis. Meanwhile, it made it possible for it to convert to the opposite. Two industrial revolutions and market economy have provided a consistent and stable cases in a long-term and broad time and space, and have provided a practical basis for the abstraction of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The defects of modern scientific rationality and the overextension of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have made value rationality salient and promote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sciences will take place in more macro and micro fields, and take as research objects the bifurcation, chaos, random and other uncertainties of things. Postmodern sciences differs from modern sciences not only in terms of their methods to deal with objects, but they can absorb or abandon the paradigms of modern sciences with new paradigms of tolerance, understanding, cooperation, creation, self-discipline and heteronomy. Before modern and postmodern sciences, the priori, abstract, and meta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rationality have been exposed. In a certain sense, they provides a momentum for rationality to turn to context. As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rationality, the West has put forward an idea to change “from rationality to reasonability”, “from authoritative rationality to critical rationality”, and “from priori rationality to practical rationality”, all of which contain the contextualization of theoretical reconstruction.

Horizontally, the dissertation makes a Chinese-western comparison of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rationality. Especially, it makes a definition of the various rationalities through classification and the choice of appellations. Meanwhile, it

puts forward two points: the overextension of rationality in form makes it contextualized in formal meaning; the scientific rationality,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and value rationality constitute the main form of human rationality. The dissertation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 "the view of broad-sense logic" to answer the reasonability for rationality to exist in the future context, and proposes that it be necessary to reconstruct a logical view which contains intuitive, deontic and multi-valued logics in a certain context.

Rationality has its property of ecological existence, and rational ecology has its particular structure and social function. In the future, the rational ecosystem will become more complex, and the reasonable criteria of the three kinds of rationality will tend to be more contextualized and embedded. The harmony of rational ecology has a special meaning to the sound operation of society. At present, China's rational ecology has shown its unharmonious aspect. The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has been overextended, and scientific rationality and value rationality have been lessened. The overflow of multivariant ideas against the mainstream social concepts has exerted a negative influence upon the sound oper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To construct a harmonious rational ecology should focus on: taking the scientific rationality as the basis, strengthening the guidance of value rationality, and restraining the overextension of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setting up a reasonable coexisting system of concepts for the multivariant and mainstream ideas.

Wenchuan earthquake and the disput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s can provide materials for people to understand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stmoder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meanwhile they can provide realistic materials for people to understand the contextualization shown by the three kinds of rationality in practice and their inner relationship with society, i. e. ecological property. The research outcome shows that rationality must be combined with a specific practice and specific context, and only under this condition can rationality have its significance of existence.

前 言

一 研究背景

理性问题，自古希腊以来一直为哲学家所关注。当前，哲学界仍热衷于谈受理性的危机和重建问题，并使这一问题凸显为当代理性哲学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关于理性的危机问题，不少学者（如哈贝马斯、马尔库塞等）从理性的形式——技术理性、科学理性的膨胀式扩展、价值理性的缺失等角度进行了广泛探讨。其实，理性危机，除了由于一些理性形式在当代社会造成广泛的社会问题，危机尚源于其自身——近现代理性的抽象、片面以及追求确定性知识的取向，使理性很难适应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的要求。于是，在理性危机中，人们要求重建理性的呼声渐次增高。理性的重建，所涉及的问题很多，但首要而迫切的任务应该在于对理性及其发展趋势进行新的认知。“完成从而认识理性是什么，从来是并且永远是真正的哲学任务。”^①

理性是个社会历史范畴，它随着人类实践的产生而产生，并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站在“回顾历史、反思现代”的角度去“重新发现理性的完整意义”，“重新发现关于可能衡量所有知识、行为、目的和价值的最终要素，”^②是把握理性及其发展趋势的可行之路，显然，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对理性进行重新考察，这将是一种辩证之否定的过程，它将

① [德] 卡尔·雅斯贝斯：《生存哲学》，王玖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126页。

② [法] 让·拉特利尔：《科学和技术对文化的挑战》，吕乃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41页。

实现对理性认知的超越。

早在古希腊时期，普罗泰戈拉曾坚持理性、知识的语境性。“人是万物的尺度”^①，意为不存在抽象的真理或永恒正确的认知标准，只有视个人感觉而定的特殊真理，特殊真理的作用如何，要看由谁来描述以及他们描述时的环境。自普罗泰戈拉以后，虽然在哲学史上先后有许多哲学家提出过真理的相对性和理性的主体性主张，但是后来的理性观（特别自培根、笛卡尔以来）还是循着追求普适性、客观性的道路发展。这种理性观，在近代以经验和搜集材料为主的科技发展的初级阶段，对于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秩序的确立确实起过巨大作用，但是，随着科学研究对象不断表现出复杂性、嵌入性、混沌性，这种理性观表现出了很难适应指导认知实践要求的一面。事实上，从本质来看，理性本身就是客观性与主观性、普遍性与特殊性、唯一性与不完善性的统一。如理性的客观性要求理性主体在设定理想目标和为目标实现进行手段选择时，应不违背客观规律（即所说的客观理性），此即合规律性要求；理性的主观性系指理性主体的目标认定和手段选择必须符合主体的内在目的或内在价值，此即合目的性要求。理性的主观性表明理性具有主体间性。

在现代社会中，激烈的冲突常体现为普遍理性同多元文化和个性化生存之间的对立，西方文化中个体自由主义传统所致的普遍理性的生存危机即是佐证。

理性的主观性、特殊性与不完善性启示人们：应该在更全面的意义上认识理性。科学发展的趋势告诉人们，未来科学的发展，将在更微观的领域把夸克及其以下层次以及生命的起源作为研究对象，在宏观领域把宇宙及其起源以及生态及其演化作为研究对象，并研究事物的分岔、混沌、随机等不确定性特征。这些趋向与特征，将不得不使人思考理性如何适应科学研究需要的问题。在社会领域，人们的价值观、文化观正在走向多元、走向与主体和语境之间新的嵌入。这些发展变化，对传统的狭隘的逻辑理性无不提出了挑战，它启示人们，必须用历史的、动态发展的眼光看待理性。

^① 注：此处所指的“人”，在更为现实的意义上应指“生活在具体情境下的现实的人”，而非抽象化的人类——作者注。

面对科学研究、技术活动、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难题，许多人对传统理性抱有怀疑——靠传统理性是否真的能获得真理性知识、解决世界的“本然”与“应然”问题。此外，西方的非理性主义者更以解构理性进而抬高非理性、贬抑理性为主旨，极力主张去除理性的中心地位。

以上表明，传统的以“逻辑”、“明晰”、“有秩序”为特征的理性观已不能满足解决现代社会面临的种种实践问题之需求，对“理性”范畴的理解，越来越需要结合“语境”、结合“具体的关系”。基于此，本书从三个角度对理性的这种语境化趋向问题开展研究，以达到重建科学的理性观之目的：一是梳理理性发生以及走过的历史，从中找出理性发展的规律；二是从现代科学的发展趋势以及后现代科学研究实践的角度研究理性应该具有的品质；三是运用汶川地震与中西医之争的案例，通过分析案例中科学理性、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三大理性的关系及其与社会的相互联系，对理性的语境性趋向进行理解与验证。

二 关于理性和语境论的研究

（一）关于理性问题的研究

对理性本体以及与理性相关的问题进行研究历来是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综观近一二十年中外关于理性问题的研究，学者们主要从以下维度开展理性问题研究。

1. 理性与文化关系。英国哲学家欧内斯特·盖尔纳、玛丽·麦根妮为此方面研究的代表人物。此维度研究理性与传统、习俗、权威、经验、情感以及零碎的试验与错误的关系，主张把如何看待理性作为一种明晰、有序、个人主义的东西^①。

2. 理性的本体论研究。虽然理性问题早就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但对于理性究竟是什么、如何产生、如何作用于人的行为、表现形式等问题，至今仍纠缠不清。可以说，当前人们关于理性问题的种种疑惑，其根源恰在于对理性的本体论研究尚不深入。因而，理性本体论研究在吸引着学界关注的目光。韩震在《重建理性主义信念》中，论述了理性是什么，理性的作用等。袁建新在《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结构关系研究》中运用

^① 参见[英]欧内斯特·盖尔纳《理性与文化》，周邦宪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拓扑结构理论，从人学、认知学角度对理性本体进行了深度探究。

3. 对理性的具体形式——科学理性、技术理性、价值理性等进行方法论、价值论层面的认知。如胡志强、肖显静合著的《科学理性方法》，运用一定篇幅对科学理性的特征、功能等进行了阐述；赵建军在著作《追问技术悲观主义》中对技术理性泛化问题进行了探究。

4. 开始关注理性的语境性问题。关于理性的语境问题，学者费多益对此较早关注。早在1999年，费多益曾以《审视理性的语境化》为题，阐述理性的语境化问题，她指出，语境作为后现代科学哲学走向的方法论倾向是科学（逻辑）理性与境遇（情境）理性的统一，从而使得理性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关注狭隘的逻辑转向关注立体的实践。^①

综观学者关于理性问题的研究可以看出，国外学者已转向从文化学、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理性问题，国内学者仍然更多地从理性与现代社会问题的关联性角度探讨理性的“原罪”与重建问题。关于理性的语境性问题，已有学者提及，但从成果看，尚无深入而系统的研究。

（二）关于语境论的研究

语境论系派普基于根隐喻理论而提的一种认识论与方法论。派普认为人们可以借助于一个熟悉的事物作为隐喻来理解其他事物，这个事物就是根隐喻。派普继而基于在日常生活中提炼的基本根隐喻提出了四个基本的世界假设：有机论、机械论、形式论和语境论。

语境论问世后，得到许多学科专业研究者的关注，比如巴尔斯在其意识的认识理论中就运用语境分析意识现象，提出了多种语境解释模型^②。西方还有学者试图把语境论和科学实在论相结合，提出了一种不同于传统分析哲学的解释模式即语境实在论理论。美国当代哲学家施拉格尔对这种新模式与传统分析哲学模式进行了详细区分。

在国内，在20世纪80年代，以山西大学的一些学者为代表，人们接受并开展了语境论问题的研究。郭贵春运用语境论开展了科学哲学问题的转向研究；魏屹东对语境论本体进行了研究，指出了语境论思想的几个重要的特征：（1）人的活动的变化——开放性；（2）知识的相对——可修

① 费多益：《审视理性的语境化——读后现代科学哲学》，《哲学研究》1999年第9期。

② 参见 B. J. Baars, *A Cognitive Theory of Consciousne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